

吳梅村全集

(清)吳偉業著
李學穎集評標校

中華書局影印

I214.92

45

B7/12/22

〔清〕吳偉業
李學穎 集評標校 著

吳梅

村全集 [上]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B

733433



書名題簽 李學曾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吳梅村全集

(全三冊)

(清)吳偉業 著

李學穎 集評標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49.375 插頁 18 字數 1,072,000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00

ISBN 7-5325-0121-3

I·26 定價(精): 31.40元



吳梅村像

顧見龍 繪

吳昌碩畫石子

禹之鼎繪



卷之三

吳梅村與人詩手稿

蘇東坡書題西廬壁
清風徐來水波不興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。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。足以極視聽之娛無足以會心也。每覽昔人興感之由亦足以悲夫。故列此序於其上使後人覽此者亦足以贊嘆焉。

吳穎林印

吳穎林印

舊藏



丁巳年夏月
吳穎林畫於上海

前 言

詩至宋末，已見式微，元、明兩代，鮮有足稱，直到明、清易代之際，才又出現一個高峯。在那階級矛盾、民族矛盾激烈嚴重的歷史環境下，湧現了多若繁星的詩人，他們的作品既不屑為三楊之館閣，也唾棄七子之摹擬，更無意於公安、竟陵之浮靡，而是務實重質，息息和時代相關，足以上摩三唐之壘。大抵殉明者多挺身抗拒的強音，入清者多緬懷故國之哀思。前者可以陳子龍為代表，而後者則應首推吳梅村。

吳偉業，字駿公，以其號梅村著名於世，別署鹿樵生、灌隱主人。江南太倉（今江蘇太倉縣）人。生於明萬曆三十七年（一六〇九）。他自幼聰慧，十四歲已通春秋及三史（史記、兩漢書），落筆為文，洋洋數千言。受知於同里著名學者和政治活動家張溥，為入室弟子。張溥聯合大江南北各文社，統一為復社，他是其中重要成員，名列「十哲」。中崇禎四年（一六三一）會元，殿試一甲第二名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制詞云：「陸機詞賦，早年獨步江東；蘇軾文章，一日喧傳天下。」時人以為無愧。這年，他才二十三歲，給假歸娶，光華滿路，榮動一時。張溥亦中是科三甲第一，選庶吉士；復社成員同榜者尚有數人。于是天下士子以入復社拜門牆為功名捷徑，復社聲勢大盛。這固由張溥的聲望才幹所致，而梅村的美才高第確也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復社雖以學術標榜，實則繼東林之餘響，在野則諷議朝政，針砭時弊，裁量人物，一旦登朝，自要有所作爲。梅村入仕之初，即疏劾時相溫體仁的私人、吏部尙書蔡奕琛；以後，歷充寶錄纂修官、東宮講讀官，又先後劾奏首輔張至發、吏部尙書田唯嘉、太僕寺卿史蘊等，雖不無朋黨意氣夾雜其間，但這些都是溫體仁的衣鉢傳人或黨羽，把持朝政，營私誤國，故梅村一時「直聲動朝右」。這自然也招致了反對派的忌恨，使他受到種種摧挫。特別是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，他升任南京國子監司業才三天，上疏申理著名直臣黃道周，觸怒了明思宗，嚴旨責問主使，差一點陷入大獄，從此他逐漸消沉下來。而座主周延儒和好友吳昌時的不得其死，尤足使他寒心，於是「絕意仕進」。這期間雖接連晉升左中允、諭德、左庶子，他都沒有就任，藉丁嗣父憂的機會，回鄉隱居。

崇禎一朝，集中並發展了萬曆、天啓積累下來的所有矛盾和積弊，這時已深深陷入內憂外患的嚴重困境。內部，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如烈火燎原，破洛陽，據襄陽，下西安，從根本上動搖明廷的統治；外部，女真貴族創建不久的清國雄踞遼東，虎視眈眈，不斷入侵，明軍一敗於高陽，再敗於鉅鹿，復敗於松山，形勢異常嚴峻。而腐朽透頂的明統治集團却忙着彼此爭奪派系的、個人的利益，君憤臣蒙，文欺武恣，互相牽制，互相傾軋，迅速走向崩潰。十七年（即清順治元年，一六四四）三月，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，建立大順政權，明思宗自縊於煤山，史稱「甲申之變」。緊接着，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勾引清兵入關，奪取了農民起義的果實，李自成兵敗走死。從此清王朝入主中原，統治了廣袤的中國土地。

朱庭珍說：「吳梅村祭酒詩，入手不過一豔才耳。迨國變後諸作，……多紀時事，關係興亡。」（筱園

(詩話)似乎明亡之前梅村所作皆爲豔體；王曾祥甚至說：「梅村甲申之前，無一憂危之辭見於豪牘。」

(靜便齋集)這未免厚誣古人了。梅村自青年時代，眼見國事日非，盱衡扼腕，寫下了許多感時傷事的詩篇。著名的臨江參軍和讀楊參軍悲鉅鹿詩，寫于崇禎十二年，是鉅鹿之敗的忠實紀錄，悲憤感激，溢滿紙上。淮陽行、襄陽樂、高麗行等篇，痛切時局；邊思、雲中將、牆子路諸首，憂念邊防。他如傷直諫被禍的「老臣自詣都詔獄，逐客新辭鵝鵠樓」(殿上行)，「直道身何在，猶爲天地傷」(溥右君以諫死其子持喪歸臨川)；憤宦官專權的「諸將自承中尉令，孤臣誰給羽林兵」(懷楊機部軍前)；疾迫害黨人的「看碑太學傷鈎黨，置酒新亭望息兵」(送左子直子忠兄弟還桐城)，何嘗不都是「憂危之辭」？而且以上所舉，還只是一部。梅村早年諸作，以避忌或散佚，大半未能存留，只有極少幾篇收入清代通行傳本四十卷梅村集。後人囿於見聞，主觀臆斷，也不足爲奇。

明亡後，梅村在弘光政權下做了兩個月的少詹事，目睹南都政局，知國事已不可爲，即託病告歸。未幾，清兵南下，小朝廷亦告覆滅。這時的梅村，既沒有殉難或反抗的勇氣，也不敢冒投降的罵名，於是選擇了一條做遺民的道路。逆來順受，不作非分之舉，以求保全身家。他告訴弟子周肇「同入幽棲傳，他年未寂寥」(溪橋夜話)，約舊友「移家就吾住，白首兩遺民」(遇舊友)，在言懷、見人作布帽等篇中，並以魯仲連、介子推、管寧自況，表明不仕的決心。

江山易代，清人入主，天翻地覆的變化，目擊身受，自然不勝黍離麥秀之感，於是，紀錄滄桑陵谷的變遷，抒發舊國故君的懷念，就成爲梅村詩的主要內容。永和宮詞、琵琶行、蕭史青門曲、思陵長公主

輓詩、田家鐵獅歌等，爲帝王戚惋唱出了一曲聲淚俱下的輓歌。「莫定三分計，先求五等封」，「北寺讒成獄，西園賄拜官」，「尙言虛內主，廣欲選良家」，「三軍朝坐甲，十客夜傳觴」，借古喻今，不著議論，弘光小朝廷的腐朽和必敗已昭然在目。聽卞玉京彈琴歌、楚兩生行、臨淮老妓行等，通過舊妓、藝人、歌女的敘述，委曲表達重大的歷史事件，分外悽哀感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梅村對南疆各殘明政權的命運十分關心，魯王舟山之敗，世子被虜，妃嬪投井，勾章井作了「蒼鯨掣鎖電光紫，擊浪噓雲食龍子」。轆轤聲斷銀瓶墜，遶殿虹蜺美人死的形象記述；而對桂王南奔，開始依靠農民軍舊部維繫殘局，則寫得更爲明確：「王孫去國餘三戶，公子從亡止五人。報主有心爭赤壁，借兵無力聽黃巾」（雜感之十）他甚至于清廷也有微詞，「先機拒戶須防虎，故智蹊田恐奪牛」（雜感之二十），「記得奉天門獻捷，亦將恩禮待和龍」（雜感之八）。無怪乎後來不敢收入本集，僅存於家藏稿了。

以上這些作品的共同基調，可以歸結爲「怨而不怒」。「莫奏霓裳天寶曲，景陽宮井落秋槐」（永和宮詞），「江湖滿地南鄉子，鐵笛哀歌何處尋」（琵琶行），「花落回頭往事非，更殘燈焰淚沾衣」（蕭史青門曲），亡國之音哀以思，這當然是由梅村自身的遭際和政治態度所決定的。

但他也有「怒」的時候，對那些賣國求榮，爲虎作倀的前明將領，就毫不諱言的表示了極大的鄙視和痛恨。圓圓曲是他的代表作，「慟哭六軍齊縞素，衝冠一怒爲紅顏」，「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紅妝照汗青」，把民族敗類吳三桂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。據說吳會「賣重幣求去此詩」，而梅村不僅不爲所動，還繼續寫了「取兵遼海哥舒翰，得婦江南謝阿蠻」（雜感之十八），「全家故國空從難，異姓真王獨拜恩」（卽事之十），

更加鞭撻入骨。在松山哀中，他直斥洪承疇，「十三萬兵同日死，渾河流血增奔湍。豈無遭際異，變化須臾間。出身憂勞致將相，征蠻建節重登壇。還憶往時舊部曲，喟然歎息摧心肝。」可謂字字見血，嚴于斧鉞；而「老臣裹革平生志，往事傷心尚鐵衣」，又是多麼辛辣的嘲諷！當時，吳三桂封平西王，洪承疇任五省經略、內院大學士。都是清王朝正在倚仗的得力鷹犬，雖然久已成爲人民嘲罵的對象，但如此口誅筆伐，也還是需要一點勇氣的。

在清室統一中國的過程中，江南抵抗最力，所遭鎮壓也最殘酷。大屠殺之後，政治上的壓迫與經濟上的掠奪，特爲尤甚。「顧以東南區區一隅，賦稅居天下之半」（江浦巡撫韓公奏議序），再加以橫征暴斂，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。梅村蒿目時艱，自不能不筆之於詩。或寫親人離散之苦（蘆山兒），或訴逋債賣子之痛（臨瀕兒）、「村人露肘捉頭來，背似土牛耐鞭苦」（挺船行），「丈量親下稱蘆政，鞭笞需索輕人命」（蘆洲行）。在沉重的賦稅和官吏的敲剝下，「吳民數百萬戶，大抵皆破矣」（太學張君季纂墓誌銘）。軍隊所到之處，更是哀鴻遍野，「大軍從北來，百姓聞驚惶。下令將人城，傳箭需民房。……插旗大道邊，驅遣誰能當。但求骨肉完，其敢攜筐箱。扶持雜幼稚，失散呼耶娘」（遇南廂閩叟感賦），「一朝鐵騎城南呼，長刀砍背將人驅。里中大姓高門閭，鞭笞不得留須臾」（題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）。士族地主階級的利益失去保障，直溪吏中的尙書後裔，已經破產，還被束縛逼迫，慘痛呼號；周易學者吳燕餘，因交不起租稅，竟遭墨吏笞辱，梅村爲此發出「范升免後成何用，甯越鞭來絕可憐」（贈學易友人吳燕餘）的浩歎。這時就連地方官也難做，他在贈穆大苑先中敍述族兄確山縣令吳國傑支應過往官軍的苦況：「身親芻秣養驛駒，供頓三軍尚嗔怒。赤

日黃埃伏道旁，鞭稍拂面將誰訴？」縣令猶且如此，百姓其尙可言！當時社會的苦難，也可窺見一斑了。正因為梅村詩繼承了「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」（白居易與元九書）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，「徵詞傳事，篇無虛詠」，題材多樣，刻畫淋漓，觸及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，展現了那個動盪險惡的時代面貌，其廣度和深度，一時無與為儷。後人稱為詩史，確是當之無愧的。

可惜他的遺民做不長久。當時，廣大的持消極不合作態度的遺民羣的存在，對尚未完全鞏固的清王朝是一個潛在的莫大威脅。越是有聲望的遺民，危險性也就越大。而他們並無抗清的實迹，雖然借鎮壓起義擴大株連，羅織殺害了一批，但單純依靠誅殺，易激起人民的不滿和反抗，于統治者不利，所以同時又採取另外一手，即懷柔政策，請他們到新朝來做官，以分化遺民隊伍，削弱其政治影響。這就是順治九年的「詔起遺逸」。

梅村以會元榜眼，宮詹學士，復社黨魁，名重一時，曾主湖廣鄉試，曾貳南雍，門生故舊半天下，在錢牧齋身敗名裂之後，儼然「為海內賢士大夫領袖」（侯方域與吳驥公書），這樣的人物，清廷豈能放過？詔書一下，他就為兩江總督馬國柱所薦，以祕書院侍讀徵。消息傳出，侯方域立即使書勸阻：「學士之出處將自此分，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分矣。」這一點，梅村當然也十分清楚，覆書「慷慨自矢」，「誓死不出」，不但呈遞了辭薦摺，而且還于順治十年四月親赴南京，面陳力辭，不能說他沒有不出的決心。可是他却還沒有意識到，正是他自己造成了不得不出的局勢。

乙酉之後，梅村自知「虛名在人」，閉戶著書，猶自「惴惴莫保」，「每東南有一獄，長慮收者在門」。幸

而他「生平規言矩行，尺寸無所逾越」，安分守己，得以無事。而他名心未除，「危疑稍定」，便忘記了韜晦，以前輩的身分，去爲各立門戶、互相攻訐的吳中同聲、慎交兩社作調解。順治十年春，大會於虎丘，「九郡人士至者幾千人」，這是繼崇禎六年張溥虎丘大會之後最盛大的一次社集，會上「奉梅村先生爲宗主」，主持兩社合盟。正趕上清廷已在加緊進行禁止社盟活動的部署，第一步先由禮部頒天下學宮，禁生員「立盟結社」。這樣，梅村在和解社局的同時，就把自己放到了一個極引人注目的位置上，自然首當其衝。「徵召」的名義是軟的，而對「重點對象」實行起來却是硬的。因此儘管同時被徵如周廷鑨、姚思孝、朱明鎬等皆得不赴，在梅村却絕無推辭的餘地。我們只要看康熙十二年徵召二曲先生李顥時，以其稱病不起，竟連楊昇至有司，李顥以絕食、自戕相抗，最後始得免一事，便可知上面「薦剡交上」，地方「逼迫萬狀」，如胡介送行詩所云「幕府徵府日夜催」，梅村寄周芮公自陳「但若盤桓便見收」，及恐連累老親，禍及家門，確爲實錄。既不能死，只有屈節，遂於當年九月應召北上。這真是「過盡九折艱，咫尺俄失墜」（送何省齋），至此不得不慨歎「盛名爲不祥」，「芝蘭自焚，膏火自煎。藏名變跡，慚彼昔賢」（漱湖行），自傷「浮名悔已遲」（別孚令）了。

仕清，對梅村自身來說，比亡國還要可怕，他成了「兩藏人」，喪失了士大夫立身之本的氣節，再也直不起脊梁來了。可以說，這是他生命中一條決定性的界線，家藏稿的前、後集就是以此來劃分的。在後集裏，身世之感占了不少篇幅。有時，他把這一切歸諸時勢和命運，用「時命苟不佑，千載無完人」（跋序）、「時命苟弗諧，貧賤安可冀」（送何省齋），「人生豈不絲時命」（遺憲等來自我解嘲，但更多的是失足

的慚愧和悔恨，觸處即發，不作諱飾。「君親既有愧，身世將安託」（贈頤雲師），「死生總負侯羸諾，欲滴椒漿淚滿樽」（懷古兼弔侯朝宗），直至臨終的「忍死偷生廿載餘，而今罪孽怎消除」，處處透露出精神上的沉重負擔。「我本淮王舊雞犬，不隨仙去落人間」（過淮陰有感），「故人往日燔妻子，我因親在何敢死！憔悴而今困於此，欲往從之愧青史」（遺憫之三），以及賀新郎病中有感的「故人慷慨多奇節，爲當年、沉吟不斷，草間偷活」，「脫屣妻孥非易事，竟一錢不值何須說」，尤爲沉痛悲愴，字字血淚，個人身世與國家民族的命運交織在一起，格外動人心絃，使後世讀者爲之悽惻低徊，或悲其遇，或原其心。論者方之庾信，應該是較爲恰當的。

入京後，授祕書院侍講，與修聖訓及孝經衍義，十三年（一六五六），升國子監祭酒。這時，他已「精銳銷喪」，無心戀棧。冬天，有嗣母之喪，便就此南歸，從此偃息不出。初時還繼續關心時局人事，順治十四年科場案起，大批江南名士遭誅戮流放，他連續寫了贈陸生、吾谷行、悲歌贈吳季子等篇，發出「倉頡夜哭良有以，受患祇從讀書始」的悲憤呼聲；十六年鄭成功江寧之敗，他以「南飛烏鵲夜，北顧鶴鵠軍」（七夕感事）、「徘徊新戰骨，經過舊臺城」（歎月）等詩句含蓄地表達了他的哀傷；十八年吳三桂擒殺桂王，他寫道「聞道長沙軍，已得滇池王」，「人言堯幽囚，或言舜野死，目斷蒼梧淚不止」（疊陽觀訪文學博），一抒故臣的痛悼。而清廷的鉗壓日緊，興「通海」大獄，造成恐怖氣氛。不久，他又因奏銷案和兒女親家陳之遴的連累，幾至破家。晚年佛鬱不樂，其間的作品，遂以山水、酬贈爲主要内容。康熙十年（一六七一）歲末病逝，年六十三歲。遺命「墓前立一圓石，題曰『詩人吳梅村之墓』」。是的，他遭逢衰季，絕意進取，無從